

新世纪初叶，安徽省水利厅一行十余人考察淮河水系来到淮阴。从王家营到码头，自然是绕不开的一段。宣传部领导知我是码头人，指令一位副部长和我陪同，兼做“导游”。

车队从治黄夺淮工程遗址西坝出发，经小清口，到宋金对峙的淮河故道，到宋代淮阴故城遗址旧县，到秦汉淮阴故城牌坊，到大清口，一路考察，到达古运河淮阴段三座古船闸之一的通济闸遗址。

站在秦汉古镇南首的大清口遗址，洪泽湖古堰零公里起点就在脚下。由此东望1公里，一座青砖黛瓦的四合院，水墨画般坐落在郁葱葱的古运河大堤上，院中一株苍劲虬虬的古银杏树突兀蓝天。

1958年，党中央决策“一定要把淮河治好！”从杨二庄到和平乡洪泽湖口，开挖一条淮新河。数万民工靠肩挑车推，蚂蚁搬家似地摆下了水利战场。

古运河在淮阴古城段，有三道节制闸，以便漕运进京。这三道船闸，当地称头、二、三闸。头闸惠济闸、二闸通济闸、三闸福兴闸。就是这一年，古运河在福兴闸处拦腰被截断，改道五河口，继续南下杭州而去。曾经的千舟过闸的繁华，只给故里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。

那一年，我8岁。一天，开河的民工从工地抬上来一块白色石头，1米多长，60厘米多宽，大约10厘米厚度。在古银杏树下放下后，打来清水，洗净泥污，四周回纹，中间四个阴文隶书赫然显现：“枚乘故里”！

围观的相亲们惊悟：这里铁定就是传说中的老乡枚乘的故居所在。枚乘，是淮阴人的骄傲。史载，枚乘，淮阴人，汉赋大家；其子枚皋，亦以汉赋著称，父子并称“二枚”。

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摩挲着俯拾皆是的秦砖汉瓦，如烟往事，历历浮现。

新中国成立时，古运河淮阴段依旧通航。关于“枚乘故里”、“枚乘书院”，只是一个“老人蒲车夕阳”的传说。遗址上满地的碎砖瓦砾，当地人称之为庙台子。仅有的一口破庙里坐着一尊满身乌黑的菩萨，烟尘中隐约看出泥胎上曾经贴着金箔。1954年，土改工作队为解决三家无房贫农住房问题，批准在“庙台”上搭房建屋。我家是三户人家之一，大白果树落在了我的屋后面。儿时，我们一群半大的“泥猴子”，常在树下玩耍，爬到菩萨的大腿上、脊背藏“蒙蒙”。

土改中，我家分了一头黄牛、几亩运河滩地。每天，太阳从运河东岸冉冉升起，父亲把我抱在犁耙上，悠扬的打着呐喊，到运河滩劳作。傍晚，晚霞映照着枚里人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空气里便荡漾出玉米粥的清香。

因为开挖淮沂河，三闸小学拆迁到二闸，改名二闸小学，校址就在故里后面的盐碱地上。由此，一群大我七八头十岁的孩子，得到了进学堂念书的机会。学校很“秀珍”，一口教室，两个老师，一个姓俞，一个姓王，王老师兼任校长。几十个孩子，分成两个复述班轮流上课。学校虽小，但在枚里人的眼里，她毕竟是2000多年后枚里子弟有了属于自己的“书院”。1962年，小学南面又建起一所初中，1971年升格为高级中学。

1958年，枚乘故里地属码头人民公社二闸大队第二生产小队。

全大队按自然村庄分成5个小队，每个小队在一起劳动，在一个食堂吃饭。

每天蒙蒙亮，钟声响起，社员们扛着一样的农具，来到同

一块田头，干着同一种农活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小队长便站在庄头，手举洋铁皮喇叭筒，大声喊：“收工吃早饭啦！”社员们又排成队，

扛着工具回来，走进进食堂，围坐在从各家集中来的大小高矮都不同的方桌前，吃着一样的馒头，就着一样的猪肉炖粉条。粮食和蔬菜是集体栽种的，猪肉是集体饲养的，粉丝是集体“漏”的。

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，一起到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。那锅真大呀，也不知是几十“仗子”的。因为锅大的原因吧，还是因为比较

一家一户，社员们管食堂叫吃“大锅饭”。

正当乡亲们唱着“电灯电话小包车一挂”的歌谣，憧憬着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时，食堂开始捉襟见肘。干饭换成了照见人的“亡人汤”（稀饭），白馒头变成了“菜多多”，一种用山芋干面包青菜的黑色窝头。再后来，菜多多也没有了，早晚两顿“亡人汤”，中午“胡萝卜香”，就是熟胡萝卜糊撒上点黄豆面，见了就嘴里冒清水。至于猪肉炖粉条，只能是在睡梦中下咽苦涩的口水。

食堂还在苟延残喘，只是饭要打回各家吃。每天放学，我和哥哥抬着小桶量子到食堂打稀饭，按人头一人一大铜勺。那铜勺真大呀，一勺有三大蓝边碗。“亡人汤”名不虚传，头一伸就照见自己黄巴巴的脸；灌到肚里，走路咣当咣当响。因为按人头分，大人多的家庭不够喝。排队打饭时总听到有人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刷锅把戴个帽子也充个人数！”食堂终于不再冒烟。营养不良成了社会问题，我的脚也浮肿起来。

为了生产自救，大一点的同学被退回生产队劳动。那时，我还是懵懂少年。大人愁吃愁喝，小孩照样无忧无虑地生活，都管我们叫“小八旗”。

春天，每天放晚学，“小八旗”们要遵命到书院后的田野里挑野菜。那里的荠菜、小蒜、蝴蝶丁、面条菜，长满原野。我们很快就挑满一篮，但不急着回家，两人一组坐下来玩瓦蛋子。瓦蛋子都是自己做的，从枚里旧址上捡来破瓦，砸碎，磨成5个大拇指大的圆形瓦球。也有人打核，抢窝里窝。太阳下山，大家一起口起篮子回家，交给大人洗菜，切菜，和上杂面，炕饼。一家人就着稀饭咸菜，吃得有滋有味。

夏天，中午放学，“小八旗”们书包一放，一窝蜂光着腚跳到书院后的沟渠里捞鱼摸虾。一顿饭功夫，每人都能提着一串大大小小的杂鱼，有“潮鱼”、“昂刺”、“参子”。凯旋归来，母亲们赶紧“刺”鱼，烧给全家“辣馋”。大人说，荒年鱼虾多，是老天爷穷人才命的。

秋天，“小八旗”们偷偷爬进河边的小渔船船里，找渔夫丢下不要的小螃蟹，悄悄拿回家，放在锅堂灰里烤熟，香喷喷地美食。

冬天到了，大白果树一身金黄。一阵西风，一场秋雨。天未亮，赶紧起床，抢先到树下捡白果，去迟了只能空手而回。白果掉皮，晒干了，聚着，等过年美美地吃一顿白果红烧肉呢！

熬过三年自然灾害，农民的日子明显好过起来。熟料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动乱，日子又打回了原形。漫长的十年动乱，超过了三年灾害带给农民造成的灾难。枚里人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光，分田到户，社办企业，粮囤子从来没有这么满，腰包从来没有这么鼓。枚里人脸上挂着笑，一户一户赛着拆掉草房盖瓦房，掀掉瓦房建楼房。

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小包车一挂”，成了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老人插嘴说：“如今平常无事象过年，潘三口也端不出这碗饭喽。”那个被称为潘三口的人，可是解放前当地的一个大地主。我是70年代末离开枚乘故里的。那时正是“三中全会”的前夜，转眼已经20多年。在古镇街头，一个名叫王珏的老友拉着我的手，连声说：“你侄子长脸了，儿子结婚，门口停着十几部轿车呢！”

是啊，农民不再是穷困的代名词，“枚乘故里”也不再是一块出土文物。2009年，政府拨款，在老先生手植的银杏树下，修复了“枚乘书院”。老先生的鸿篇《七发》，就金灿灿地镌刻在故里的厅堂上。

“秦时明月汉时风，隋唐运河沐春风。”以“枚乘故里”为圆心，2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，2300年历史的秦汉古镇，韩信城，甘罗城，韩侯故里，钓鱼台，跨下桥，漂母祠，韩母墓，四龙碑，胭脂湖，惠济祠，关帝庙，凤神庙，东文庙、龙华寺、大王庙……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安徽的客人即将踏上归程。临别时，他们留下这样一句话：

“如果把大运河申遗项目比作中国文化的项链，那么，枚乘书院就是项链上一颗璀璨的珍珠！”

新世纪初叶，安徽省水利厅一行十余人考察淮河水系来到淮阴。从王家营到码头，自然是绕不开的一段。宣传部领导知我是码头人，指令一位副部长和我陪同，兼做“导游”。

车队从治黄夺淮工程遗址西坝出发，经小清口，到宋金对峙的淮河故道，到宋代淮阴故城遗址旧县，到秦汉淮阴故城牌坊，到大清口，一路考察，到达古运河淮阴段三座古船闸之一的通济闸遗址。

站在秦汉古镇南首的大清口遗址，洪泽湖古堰零公里起点就在脚下。由此东望1公里，一座青砖黛瓦的四合院，水墨画般坐落在郁葱葱的古运河大堤上，院中一株苍劲虬虬的古银杏树突兀蓝天。

1958年，党中央决策“一定要把淮河治好！”

从杨二庄到和平乡洪泽湖口，开挖一条淮新河。

数万民工靠肩挑车推，蚂蚁搬家似地摆下了水利战场。

古运河在淮阴古城段，有三道节制闸，以便漕运进京。这三道船闸，当地称头、二、三闸。头闸惠济闸、二闸通济闸、三闸福兴闸。就是这一年，古运河在福兴闸处拦腰被截断，改道五河口，继续南下杭州而去。曾经的千舟过闸的繁华，只给故里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。

那一年，我8岁。一天，开河的民工从工地抬上来一块白色石头，1米多长，60厘米多宽，大约10厘米厚度。在古银杏树下放下后，打来清水，洗净泥污，四周回纹，中间四个阴文隶书赫然显现：“枚乘故里”！

围观的相亲们惊悟：这里铁定就是传说中的老乡枚乘的故居所在。

枚乘，是淮阴人的骄傲。史载，枚乘，淮阴人，汉赋大家；其子枚皋，亦以汉赋著称，父子并称“二枚”。

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摩挲着俯拾皆是的秦砖汉瓦，如烟往事，历历浮现。

新中国成立时，古运河淮阴段依旧通航。关于“枚乘故里”、“枚乘书院”，只是一个“老人蒲车夕阳”的传说。遗址上满地的碎砖瓦砾，当地人称之为庙台子。仅有的一口破庙里坐着一尊满身乌黑的菩萨，烟尘中隐约看出泥胎上曾经贴着金箔。1954年，土改工作队为解决三家无房贫农住房问题，批准在“庙台”上搭房建屋。我家是三户人家之一，大白果树落在了我的屋后面。儿时，我们一群半大的“泥猴子”，常在树下玩耍，爬到菩萨的大腿上、脊背藏“蒙蒙”。

土改中，我家分了一头黄牛、几亩运河滩地。每天，太阳从运河东岸冉冉升起，父亲把我抱在犁耙上，悠扬的打着呐喊，到运河滩劳作。傍晚，晚霞映照着枚里人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空气里便荡漾出玉米粥的清香。

因为开挖淮沂河，三闸小学拆迁到二闸，改名二闸小学，校址就在故里后面的盐碱地上。由此，一群大我七八头十岁的孩子，得到了进学堂念书的机会。学校很“秀珍”，一口教室，两个老师，一个姓俞，一个姓王，王老师兼任校长。几十个孩子，分成两个复述班轮流上课。

学校虽小，但在枚里人的眼里，她毕竟是2000多年后枚里子弟有了属于自己的“书院”。1962年，小学南面又建起一所初中，1971年升格为高级中学。

1958年，枚乘故里地属码头人民公社二闸大队第二生产小队。

全大队按自然村庄分成5个小队，每个小队在一起劳动，在一个食堂吃饭。

每天蒙蒙亮，钟声响起，社员们扛着一样的农具，来到同

一块田头，干着同一种农活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小队长便站在庄头，手举洋铁皮喇叭筒，大声喊：“收工吃早饭啦！”社员们又排成队，

扛着工具回来，走进进食堂，围坐在从各家集中来的大小高矮都不同的方桌前，吃着一样的馒头，就着一样的猪肉炖粉条。粮食和蔬菜是集体栽种的，猪肉是集体饲养的，粉丝是集体“漏”的。

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，一起到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。那锅真大呀，也不知是几十“仗子”的。因为锅大的原因吧，还是因为比较

一家一户，社员们管食堂叫吃“大锅饭”。

正当乡亲们唱着“电灯电话小包车一挂”的歌谣，憧憬着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时，食堂开始捉襟见肘。

干饭换成了照见人的“亡人汤”（稀饭），白馒头变成了“菜多多”，一种用山芋干面包青菜的黑色窝头。再后来，菜多多也没有了，早晚两顿“亡人汤”，中午“胡萝卜香”，就是熟胡萝卜糊撒上点黄豆面，见了就嘴里冒清水。

至于猪肉炖粉条，只能是在睡梦中下咽苦涩的口水。

食堂还在苟延残喘，只是饭要打回各家吃。每天放学，我和哥哥抬着小桶量子到食堂打稀饭，按人头一人一大铜勺。

那铜勺真大呀，一勺有三大蓝边碗。

“亡人汤”名不虚传，头一伸就照见自己黄巴巴的脸；灌到肚里，走路咣当咣当响。

因为按人头分，大人多的家庭不够喝。排队打饭时总听到有人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刷锅把戴个帽子也充个人数！”

食堂终于不再冒烟。营养不良成了社会问题，我的脚也浮肿起来。

为了生产自救，大一点的同学被退回生产队劳动。那时，我还是懵懂少年。大人愁吃愁喝，小孩照样无忧无虑地生活，都管我们叫“小八旗”。

春天，每天放晚学，“小八旗”们要遵命到书院后的田野里挑野菜。

那里的荠菜、小蒜、蝴蝶丁、面条菜，长满原野。我们很快就挑满一篮，但不急着回家，两人一组坐下来玩瓦蛋子。

瓦蛋子都是自己做的，从枚里旧址上捡来破瓦，砸碎，磨成5个大拇指大的圆形瓦球。

也有人打核，抢窝里窝。

太阳下山，大家一起口起篮子回家，交给大人洗菜，切菜，和上杂面，炕饼。

一家人就着稀饭咸菜，吃得有滋有味。

夏天，中午放学，“小八旗”们书包一放，一窝蜂光着腚跳到书院后的沟渠里捞鱼摸虾。

一顿饭功夫，每人都能提着一串大大小小的杂鱼，有“潮鱼”、“昂刺”、“参子”。

凯旋归来，母亲们赶紧“刺”鱼，烧给全家“辣馋”。

大人说，荒年鱼虾多，是老天爷穷人才命的。

秋天，“小八旗”们偷偷爬进河边的小渔船船里，找渔夫丢下不要的小螃蟹，悄悄拿回家，放在锅堂灰里烤熟，香喷喷地美食。

冬天到了，大白果树一身金黄。一阵西风，一场秋雨。

天未亮，赶紧起床，抢先到树下捡白果，去迟了只能空手而回。

白果掉皮，晒干了，聚着，等过年美美地吃一顿白果红烧肉呢！

熬过三年自然灾害，农民的日子明显好过起来。熟料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动乱，日子又打回了原形。

漫长的十年动乱，超过了三年灾害带给农民造成的灾难。

枚里人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光，分田到户，社办企业，粮囤子从来没有这么满，腰包从来没有这么鼓。

枚里人脸上挂着笑，一户一户赛着拆掉草房盖瓦房，掀掉瓦房建楼房。

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小包车一挂”，成了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老人插嘴说：“如今平常无事象过年，潘三口也端不出这碗饭喽。”

那个被称为潘三口的人，可是解放前当地的一个大地主。

我是70年代末离开枚乘故里的。那时正是“三中全会”的前夜，转眼已经20多年。

在古镇街头，一个名叫王珏的老友拉着我的手，连声说：“你侄子长脸了，儿子结婚，门口停着十几部轿车呢！”

是啊，农民不再是穷困的代名词，“枚乘故里”也不再是一块出土文物。

2009年，政府拨款，在老先生手植的银杏树下，修复了“枚乘书院”。

老先生的鸿篇《七发》，就金灿灿地镌刻在故里的厅堂上。

“秦时明月汉时风，隋唐运河沐春风。”以“枚乘故里”为圆心，2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，2300年历史的秦汉古镇，韩信城，甘罗城，韩侯故里，钓鱼台，跨下桥，漂母祠，韩母墓，四龙碑，胭脂湖，惠济祠，关帝庙，凤神庙，东文庙、龙华寺、大王庙……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安徽的客人即将踏上归程。临别时，他们留下这样一句话：

“你侄子长脸了，儿子结婚，门口停着十几部轿车呢！”

“如果把大运河申遗项目比作中国文化的项链，那么，枚乘书院就是项链上一颗璀璨的珍珠！”

回望王家营

■ 董蕾

随着新一轮淮阴区行政区划的调整，撤销王营镇，设立王家营等四个街道办事处。至此，王家营这个名字终于众望所归，再次从